

景出眼前 情寄言外

——李白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赏析

李雨丰

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

孤帆远影碧空尽，惟见长江天际流。

由于二人年龄上的悬殊，生活境遇的差异，李白赠孟浩然的诗作并不多，除本诗外，还有《赠孟浩然》、《春日归山寄孟浩然》二首，而《春日归山寄孟浩然》又是颇有争议的作品。对此，明·胡震亨在《李诗通》中曾说：“玩诗意，乃偕一显者游禅寺和诗，疑题有误。”清·王琦亦说，他曾看到一个伪称宋刊本的《姑苏缪氏本》，颇有可取之处，该本认为此诗应是“赠孟六浩然”。他指出：“孟六浩然恐是孟贊府之讹”（参看王琦《李太白全集·卷一四》及其《李太白集辑注序》）。孟贊府何许人不详，唐人称县丞为贊府，且李白对孟贊府以义兄呼之，则此诗非赠孟浩然甚明（参看《送孟贊府兄还都序》）。退一步说，即使此诗确系寄孟浩然，我们认真加以玩味，也的确难以看出和孟浩然有什么关系。真正倾注李白对孟浩然仰慕之情的就应是《赠孟浩然》一诗了。诗中说：“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。红颜弃轩冕，白首卧松云……高山安可仰，徒此揖清芬。”其中对孟浩然崇敬、赞美、景仰的挚情充溢于言表，更饱含对孟浩然的终生评价。这样一首诗，应当是写于孟浩然漫游江淮吴越重返故乡归隐鹿门之后，病卒前不久。虽然孟浩然卒时（740）才五十二岁，头发不致全白，但所说“白首”、“红颜”之句，所标示的正是“终生”之意，亦是李白倍加崇敬的原因（对此诗，中国科学院文研所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认为是李白在安陆居住时的青年时期所写是欠妥的）。了解了这一层，对赏析《送孟浩然之广陵》一诗，是会有一定帮助的。

《送孟浩然之广陵》一诗写作的时间，亦是有迹可寻的。孟浩然东游吴越是公元732年（43岁）到长安求仕失望之后，而开元十三年——二十三年（725——735）即李白二十六岁——三十五岁之间，又是作者“酒隐安陆，蹉跎十年”（《送侄耑游庐山序》）之际。两相照应，此诗应写于公元733——734年之间、李白三十三、四岁时。又诗中一开始以“故人”相称。故人者，故旧之交的意思，而从李、孟的诗作及传记中又未发现二人此前的交往。那么，故旧之交，又是从何说起呢？

李白于二十五岁出川后，首先就是漫游襄汉，一年之后才到了安陆（属武昌管辖）。



在襄阳期间，他曾游历了岘山、大堤，登了山公楼，亲观堕泪碑〔注〕，并写下《襄陽曲》、《襄陽歌》等不少诗篇，乃致日后对这段经历仍久久不能忘怀。在《忆襄陽旧游赠马少府巨》一诗中说：“昔为大堤客，曾上山公楼……高冠佩雄剑，长揖韩荆州……空思羊叔子，堕泪岘山头。”就是明证。虽然在李、孟的诗作中并未提到过有关二人的接触和交往，但此时孟浩然正三十六、七岁，尚隐居故乡，从李白对孟浩然殷切的仰慕心情来看，二人的相会、交往必在此时。反之，“故人”一辞就没有来由了。下面且看原诗：

首句，故人西辞黃鶴樓。

黃鶴樓，故址在今湖北省武昌市蛇山的黃鶴矶头，与江北汉阳的龟山遥遥相望，下瞰长江，为历来登临胜地。李白正是在这里送别孟浩然的。孟浩然所去之地——扬州在武汉之东，故曰“西辞”。本句除点明所送之友、送别之地、友人将去之所外，还必得就上面提到的、也是重要的“故人”一辞说开去。“故人”最早见于《墨子·贵义》一篇，唐人诗作中用“故人”的甚多。诸如：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（王维《送元二使安西》），“无将故人酒，不及石尤风”（司空曙《留卢秦卿》），“故人具鸡黍”（孟浩然《过故人庄》），“今日翻成送故人”（司空曙《峡口送友》）……其旨皆在表现情摯义重的友情。这对李白来说更是如此。据宋·洪迈《容斋四笔》载：“云（李白）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，指南死于洞庭之上，白袒服（祭服）恸哭，炎月伏尸，猛虎前临，坚守不动，遂权殡于湖侧。数年来观，筋肉尚在，雪泣持刀，躬申洗削，裹骨徒步负之而趋，遂丐贷营葬于鄂城。其存交重义如此。”可知本诗内的“故人”一语，并不仅于“故旧之交”，更侧重于以道义为基础的真情摯义，将故旧、仰慕、深情、道义等诸种含义完全融于二字之中，由衷的表现出诗人对孟浩然拳拳钦慕之情。

次句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

扬州，就是题目中所说的广陵，自楚、汉直到魏晋皆延用此称，隋开始改广陵为扬州，到天宝元年复改为广陵，地在今江苏扬州市东北。题中“广陵”与文中“扬州”重言，除与行文、韵律有关外，实起着突出孟浩然东游地点的作用。“三月”指送别时间无疑，但“三月”之前冠以“烟花”也是大有文章的。“烟花”的含义，在这里并非指花笼云霭，如韦应物所说的“阴壑云松埋，阳崖烟花媚”（《与从侄成绪游山水中道先归寄示诗》）中的烟花，而是泛指春景——晴空万里，日暖风和，淡淡几缕薄雾映衬着芳菲缤纷、红紫明灭、争相斗艳的嫩蕊鲜花那样的春日景色，重在渲染送别时的大好风光。

多情自古伤离别，凡是送别总难免带有几分凄凉，而李白却以“烟花”来状绘“三月”，为什么？看来须将所去之所、送别之时、饯别之地联系起来进行观察，才能见其究竟。扬州，自然是全国景物称胜之地、富贵秀丽之乡，无论何人，漫游扬州都无疑是一大乐事。出发季节，又是“烟花三月”，沿江两岸自然山青野秀、柳暗花明，更能使人心旷神怡。对此，作为孟浩然来说，即使因长安求仕失意而有某种伤感，也会为之而置于九霄云外的。但送行者李白，情况就有些不同了。虽然，在此期间他曾拜会了荆、襄一带的政治名流，希其援引，特别拜求襄陽刺使韩朝宗给他“阶前盈尺之地”使他能“扬眉吐气，激昂青云”（《与韩荆州书》），但始终未能摆脱“蹉跎十年”的境遇。

文学，不管是什么样式的文学作品，总是以人、以人的思维活动心理状态为中心的，而思维活动又是人们主观意愿与现实境遇矛盾统一的产物；因之，这次黃鶴樓送别，虽然二

人都难免有伤别之感，但具体的心情、感受应当是不同的。个人的追求，现实的境遇，对孟浩然的景仰、敬重乃至几分羡慕……李白的思想感受实际是更深刻更丰富的。登上黄鹤楼，使他不能不联想起崔颢的题诗：据《唐才子传·卷一》载，当李白看到《黄鹤楼》诗时，曾感慨地吟道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”。此时此刻，又怎能不会有：“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……”之感呢？正是，去者飘然而去，留者寂然自愁，送客者之情是远远重于被送者之情的。题目明标“黄鹤楼”，文中重言“下扬州”，其上又贯以“烟花三月”，其含义恐怕正出于此吧。所以，全诗重点就落在一个“送”字上，自然而然地转向了第三句：

孤帆远影碧空尽。

对此句，陆游的《入蜀记》作“孤帆远映碧山尽”，将“影”作“映”，“空”作“山”。姑不论何说为庐山真面目，但就其意境看，后者是远不如前者的。帆映碧山实际应是乘舟江行的感受，而远影碧空才真正能表达送行者的深情。所谓的“帆影尽则目力已极，江水长则离思无涯”（唐汝询《唐诗解》），不仅写尽了“送”字之意，更含蕴无限怅望之情。不少文学作品，多有这样的情节，即送行者往往注视着比如起飞的飞机直到看不见为止，藉以表达其送别时的内心活动，或者叫“银鹰远影碧空尽”吧！对此不能视为单纯的因袭，根本的正说明此句所概括出的人们共同具有的典型心理。李白送孟浩然一未止于饯别、二未止于登舟、三未止于起锚挥手致意，而是站在黄鹄矶头，目送帆影，越走越远，直到无影无踪。真是望到水尽处，水尽碧空里，对着这水天相接的碧空，确实是望眼欲穿而迟迟不忍离去，身送、目送、神送完全融为一体，使一句表面看来只是由近及远、乃至无极的眼下风光，却饱含着“送”字的无穷思绪，紧紧与题目中的“送”相呼应，无声的显示出“送”在全诗中所具有的分量。

去者已去，孤帆已没入碧空。“送”的使命业已告一段落；但是，全诗到此并未结束。怎样收尾？祝愿行人，无从听见；安慰自己，心烦意乱又从何说起？如此种种，只有寄之于眼下所见：“惟见长江天际流”。这样一句，当然首先是出自对现实实景的摄取。友人已去，帆影渺然，最易于出现在诗人眼帘中的只有这不舍昼夜、向天际奔流的滔滔江水。这并非说此外就没有其他景物，关键的还在于这一江春水最能牵动作者的衷肠，从而使诗的意境超越现实而显得更为深入，更为扩大。物换星移，日月递代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无数英雄人物已成历史陈迹，只有这万里长江则永无止息的滔滔东流，用“白云千载空悠悠”来印证，是不难透视出李白此时的心境的。在此之前，尚和“故人”推杯助盏；三月烟花、一片白帆，亦可聊慰诗人情怀，而此时此刻则唯余长江……真是天地虽大，自己却是无限孤寂；宇宙虽广，自己却感无穷空虚；独自一人，黄鹄矶头，说不尽的冷落和寂寞。诗虽一句，却将诗人这时“空”、“孤”、“寂”的心境全盘托出，用崔颢的诗来说，正是“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”。的确，作为送别的具体情节可以到时终止，而作为人们的思维活动则是永远也不会出现断裂层的。李白此时的心绪究竟怎样，为什么独独寄情于不尽长江？是需要联系诗人“酒隐安陆”十年中的具体际遇而加以玩味的。

回过来再看全诗。乍一看去，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写景，无时不在写景：黄鹤楼、三月烟花、碧空白帆、滔滔江水……四句诗从脚下的黄鹄矶写到“天际”，从遍地繁花到碧空万里，川流不息的长江、顺流而下的孤舟，被送者的殷勤话别、送行者的依依难舍……组

成一幅壮丽辽阔、色彩绚烂而富于意境的画轴。这个并非臆想、尽出眼际的画面，以其自身的自然美给人以无限美的享受，发挥着无穷的艺术力量。

但是，深入之余，在这壮丽辽阔景色之中，所蕴含的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每一景物都在牵动着作者的思绪与情怀。文学家的感情是丰富的，表现方式则是不同的。本诗正是在其“美”的后面、在读者美的感受中，抑压着诗人丰富而愁苦的深情的。攫其主要，不外两个方面：一是借送别的时、地、景，隐约显现出孟浩然“骨貌风清，风神散朗”的风姿仪表，和内在“好乐忘名”的情操（参看王士源《孟浩然集序》），以及作者对孟浩然景慕眷恋之情。二是借送别之际，突出别前别后某些现实景物来衬托作者因空、孤、寂而出现的“愁”。这种愁是在主观意愿和现实际遇所形成的矛盾中产生的。具体地说，就是：想“扬眉吐气”而机遇难寻，欲“激昂青云”而无人援引。在送别中，真是慕浩然而难及，望浩然而不见，学浩然而不能……最终不能不将重点落在“送”字与别后的思绪上来。

〔注〕岘山、大堤、山公楼、堕泪碑皆襄阳古迹。其中：

岘山，在襄阳东南九里处，东临汉水，为古今要道。

大堤，在襄阳城外，东临汉水，西自万山经灊溪、土门、白龙池、东津渡，绕城北老龙堤，再至万山山麓，周围四十余里。

山公楼，晋朝山简（季伦）为襄阳太守，常至高阳池游，必大醉而归。故名之曰山公楼，今亡所在。

堕泪碑，晋朝羊祜（叔子）镇襄阳长达十年，颇有政绩，为民所称。死后，襄阳人为之罢市巷哭，并于羊祜平日游息之所建碑作纪念。后杜预镇守襄阳时，命此碑为堕泪碑。

责任编辑：章皆淳

（上接66页）

风，私有观念不重，灵魂洁净。也由于“文革”时期中央对边疆地区的政策有种种限制，跟内地不一样。梨花林中出现的那些人和事，由于安排在那个典型环境里，所以是合乎情理的。

在那个典型环境里，自然风光美和人的心灵美和谐地统一在一起。我认为此作立足于现实，而隐含浪漫主义的气息。

作者写此文之后又写过一篇《深情写梨花》的文章。我看作者不仅对品质高尚的梨花姑娘一往情深，而且对整个边疆兄弟民族也是深情一片。他写文章就是为了表达对他们的爱。

《驿路梨花》一文寄托了作者的理想，是党的“三中全会”给作家带来了希望；他希望在新的历史时期，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扬光大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，雷锋精神在神州大地开花结果。

责任编辑：章皆淳